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與路徑選擇*

倪 外

【提 要】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於“一國兩制”最新實踐及國家應對複雜的國際與地區形勢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經濟發展功能定位受外部環境變化趨勢影響,階段性演進特徵明顯,而與內地經濟發展趨勢與需求地契合直接決定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效。新發展階段,香港經濟發展功能定位核心是立足於內地經濟腹地,面向全球頂級層次經濟競爭。重點是以金融創新構建全新內涵的國際金融中心,聯結全球與內地創新要素資源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發展全球標準與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中心,進行全球領先營商環境發展示範與內地導入,成為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前進“基地”及“試驗場”。在發展路徑上,突出地區間合作內涵與模式創新,先進制度性要素導入,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更新,人才培養與流動,以及新規則談判配合等。

【關鍵詞】 香港 經濟 戰略定位 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038 - 11

中共二十大明確指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由此,香港在新階段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回歸 27 周年,香港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GDP 總額由 1997 年的 1.32 萬億港元增長到 2023 年的 2.99 萬億港元,進出口總額由 3.07 萬億港元增長到 9.50 萬億港元,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香港在構建我國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香港經濟發展集合了西方傳統市場經濟驅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驅動的雙重動力機制,是“一國兩制”體制下香港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的關鍵階段。國際經貿大環境不穩定,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疲軟。全球生產網絡處於再調整過程中,結構性與周期性矛盾突出。中國經濟發展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且外部環境發生較大轉變,受到外部發展遏制的局勢短期不可逆。香港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階段香港特區國家安全治理研究”(項目號:23BZZ019)、上海市軟科學重點項目“滬港高科技產業園區發展合作的策略與路徑創新研究”(項目號:23692105400)的階段性成果。

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在複雜的外部環境下,香港對於內地發展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新階段,應該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安全等多重角度綜合考慮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格局中的定位,^①在東盟等區域性經濟體系中更好發揮經濟樞紐的功能與優勢,^②以“超級聯繫人”角色全方位服務於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③在具體合作途徑中,探索諸如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基於“多平台疊加”的“自貿區+重大平台+特色平台”的縱向合作及“雁陣聯動”的橫向合作^④等。未來五年是香港突破發展階段性困境,開創新局面的關鍵期,其發展成效對於“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及國家應對複雜的國際與地區局勢具有重要意義。“香港所長,國家所需”的發展格局首先需要在宏觀戰略層面明確新格局下香港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由此,基於國家關於香港發展總體定位的前提,進一步探討新階段香港經濟發展的功能定位與路徑選擇,以及香港在全球及地區經濟活動中的新角色和新作用等重大發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基礎

新階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涉及城市群、區域合作、產業經濟等多方面內涵,相關理論基礎有着多重角度的詮釋。首先是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動力機制作用,基於協同論、系統論及耗散結構理論,城市群子系統之間相互影響、促進與制約,在城市空間結構內形成競爭合作、協作互補的網絡關係,產生積極的協同效應。^⑤同時,城市群內部不同等級城市發展的地位與作用差異性顯著。“全球城市”理論認為,全球化背景下超大城市成為全球經濟關鍵節點,在區域經濟體系中具有引領地位與作用。^⑥在全球化框架下,全球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及跨境經濟活動促進區域產業集聚,均衡一體化發展,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使大都市和城市區域成為經濟增長源動力。^⑦其次,在全球化條件下,經濟一體化的區域相對於獨立的城市或區域在經濟區位、產業結構、專業化等方面更具有發展競爭力,特別是規模報酬遞增的實現。^⑧同時,區域內不同經濟主體間內在聯繫一直處於調整過程中,一般經歷貿易互通、要素流動、政策銜接,以及完全一體化等不斷演化的發展過程,表現為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經濟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等不斷演進的區域關係。^⑨區域一體化過程動態地消除了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經濟歧視與差別待遇,加強了政府間在制定和實施稅收、安全、環境法規等政策體系的合作,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及准入門檻,增加區域市場的競爭活力。^⑩另區域內高附加值產業與服務業促進 GPN 的建立,使區域經濟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據領先地位。^⑪諾斯等認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具有內在聯繫,有效的制度、政策創新能夠促進區域間要素流動,提升區域要素系統的配置效率,區域制度的創新與突破能夠促進經濟持續增長。^⑫而區域經濟一體化一般通過兩種路徑實現:一是消除歧視和管制制度推動經濟貿易自由化;二是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⑬再者,在產業發展方面,錢納里在《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中認為區域經濟增長進入後工業階段,通過產業結構優化來推動區域向更高發展階段躍進,其主導產業表現出科技進步,區域擴散的發展特徵。羅默和盧卡斯等學者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進一步指出跨區域知識外溢、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等促進內生性的技術創新,而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是區域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認為區域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創新技術方向選擇差異的問題,不同區域應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各自具有優勢的產業,通過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區域乃至國家的整體產業結構升級。^⑭

此外,“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階段香港發展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重點是在經濟、民生等領域突破舊的發展模式和格局。首先,在香港與內地經濟交流中,核心支撐要素由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向着數字要素、人才要素、資

本要素等新要素系統轉變；其次，香港與內地經濟聯繫，由全球產業梯度轉移背景下，全球生產網絡製造業空間與外部市場的聯通，轉變為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法律、規則、標準等與全球通行的制度性軟環境對接與融合的新聯繫。在“製造”向“科創”、“服務”功能轉換過程中，香港與內地的區域政府間治理架構、市場經濟體系新規範、創新技術擴散體系、區域內外部關係等需要進行系統性重構；區域間生產關係，市場利益主體，功能區布局，合作對象、方式、路徑與機制等全面升級調整，帶來區域功能定位、經濟形態、產業結構，及城市空間的調整。新階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跨境合作實踐過程中，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對外開放發展的新理念、新理論、新模式及新路徑。在新理論體系中突出強調香港經濟發展集合了西方傳統市場經濟驅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驅動的雙重動力機制，強調“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融合發展的理念。由此，新階段“一國兩制”下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基於新要素系統、新區域關係、新發展動能、新發展理念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新地區實踐。

二、外部環境特徵與發展挑戰

（一）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外部環境

香港作為高度國際化的城市，經濟發展與全球、國家發展環境密切相關。香港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屬於典型的開放型、外向型自由港經濟體，外部環境變化趨勢和特徵是其經濟重新定位和再出發的重要影響因素。^⑤同時，國家經濟發展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經濟發展目標和內涵的根本性調整對於香港經濟產生深刻影響。

1. 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世界經濟呈現新趨勢、新特點

目前，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及區域經濟局部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對香港經濟發展影響巨大。一是美西方以“去風險”名義實施“逆全球化”進程，對當前全球經濟體系與格局進行調整。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地緣政治與局部地區衝突，以及關稅貿易壁壘紛爭等影響下，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遭遇停滯風險，正在形成以歐盟、北美和東亞三大區域性經濟體系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新格局。且美國聯合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試圖建立“小院高牆”，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繼續倡導的全球化進程處於歷史性的博弈過程中。特別是，美國在亞太主導的各種競爭性、對抗性和排他性的區域性經濟、政治組織根本性的改變地區發展大環境，全球南方市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等日益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的外部合作區域及主體目標。區域主流的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合作的發展格局逐漸轉向為遏制、圍堵和選擇性合作。二是在多重外部非市場經濟因素影響下，全球及區域供應鏈體系處在重新深度調整過程中，傳統產業回流發達經濟體與分散轉移至新的區域性產業中心並行。在此過程中，區域內經濟中心，貿易樞紐，航運中心的功能、規模及能級等此長彼消。經濟區位的要素構成、權重結構與空間分布等正在調整轉移，新的經濟增長重心，特定產業經濟功能配置，經濟影響力等逐漸顯現新的變化趨勢。三是全球投資新規則及貿易新格局正在形成，以 CPTPP、RCEP、IPEF 等為代表的新的貿易規則、機制及貿易組織正在形成，重塑全球經貿格局，整體更加重視服務貿易規則，並且轉向經濟規則，地緣政治因素滲透其中並影響深遠。^⑥亞太地區疊加重複區域性經貿組織與經濟體系，被附加具有一定競爭性的集團性經貿規則，不同經濟體間一體化的分異與重組並行，且內部經濟一體化政策逐步拓展，制度空間、制度權力及制度層次扁平化。

2. 國家高質量發展轉型與對外開放新格局

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整體處於工業化後期向後工業化躍進的關鍵爬坡階段,距離發達經濟體的准入門檻尚有部分關鍵指標存在較大差距,但整體發展的規模、質量、能級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①目前,中國經濟的供應鏈體系、產業鏈體系、價值鏈體系等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網絡中,部分行業企業進入傳統發達經濟體主流的貿易、金融、科技等領域高端環節,引發全球舊的產業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重塑地區及全球經濟秩序。在內部,中國經濟發展處於轉型的關鍵過渡階段,在要素系統、產業結構、制度規則、區域關係、發展動力等方面進行系統重構與升級,整體從匹配經濟規模性增長需求向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轉型。新階段,以自貿試驗區、先行示範區、現代化引領區等一批不同內涵、性質、層次的區域性試點改革探索下一階段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徑。其中,相關改革重點在於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產業經濟體系;完善與世界接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市場規則與標準體系等,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發展動力由基於要素投入,成本導向,技術權力控制下的外源型技術導入,轉向基於原創科技創新、制度規則創新等驅動發展。整體上,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內涵、新目標、新特徵、新需求等帶給香港發展新的機遇與挑戰,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3. 香港經濟之於國家經濟的地位、功能與角色轉變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受內地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及國際關係影響。在內地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背景下,香港經濟之於內地經濟的傳統功能優勢弱化,“經濟勢差”趨平。內地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布局系列世界級港口群,且功能日趨完善,技術愈加先進,直接促使香港轉口貿易海量分流。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以及內地重點地區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綠色低碳工業等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等領域發展趕超香港。全球化條件下,內地與全球主要經濟樞紐及市場的直接聯繫強化,基於空間臨近性的地理區位功能優勢逐步削弱,降低了對於香港經濟功能的依賴。同時,香港面臨新加坡、上海等同類全球城市的競爭,支撐香港經濟轉型的外部環境趨緊。未來香港經濟功能地位變化趨勢是基於“經濟勢差”均等互補的樞紐功能突出,“平台服務”功能強化,“渠道”功能優化。相較於倫敦之於歐盟、紐約之於北美的經濟中心與經濟腹地關係,內地經濟腹地的崛起及全球市場網絡的完善發展,賦予香港全球經濟中心的新角色作用和功能地位。

(二)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依賴與挑戰

香港經濟發展主要受市場經濟規律作用影響,從開埠至今主要經歷三次轉型:外部導入現代工業基礎,城市型工業化經濟體系轉型,^②傳統製造業本港衰落與北上興起,自由港服務經濟轉型,^③以及經濟結構性困境,全球經濟中心緩慢轉型。^④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相較於曾經的其他“四小龍”經濟體,最大的發展制約是高端製造業升級環節缺失。香港經濟發展階段性困境一方面受制於區內產業經濟升級緩慢;另一方面,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影響下,傳統的支撐香港經濟發展的優勢資源稟賦結構性失衡,外部環境發生逆轉,主要目標市場陷入周期性困境,直接與間接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

1. 內地經濟腹地放大香港既有優勢,獲“世界工廠”規模效益溢出

香港經濟轉型,既是二戰後全球產業經濟轉移的大背景下,全球產業梯次轉移至東南亞的演替效應,同時也是內地經濟由封閉轉向開放,逐步融入全球產業經濟網絡,香港在其中承接轉移,傳遞內地與外部市場經濟聯繫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全球經濟發展驅動力先後經歷知識經濟、綠色經濟、智能經濟等轉變,由曾經的基於電力技術的全球產業體系與工業格局,延替到最新的基於人工智能等技術突破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全球產業體系與經濟格局的再一次重組。其中,伴隨全球

新興經濟體增長,全球治理體系的調整,全球經濟發展一直處於深刻變革中。內地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崛起,深刻改變全球經濟格局,重塑香港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及內部功能。內地經濟腹地賦予香港經濟發展短缺的經濟要素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力、能源等資源以及市場空間;促使香港發展積累的資本等優勢經濟資源在內地巨大的市場空間中找到新的投資機會,資本的投資效益再一次擴大。且香港製造業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規模及技術層級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跨國經營與生產。而珠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初期土地資源、勞動力成本具有絕對競爭優勢,促使勞動密集型、規模擴張型經濟發展迅速,成就“世界工廠”奇跡。香港的既有優勢在以內地為核心的低端製造產業鏈及全球生產網絡中獲得最大收益,但也形成了路徑依賴,錯失重大機遇。

2. 內部結構固化,創新驅動力不足

香港經濟前兩次成功轉型及核心競爭力培養與其對全球及區域經濟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及與自身優勢的高度契合密切相關,轉型成功決定於內地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外部環境與香港經濟轉型的高度契合。香港第三次轉型最大的背景即是內地經濟全面轉型升級及全球以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綠色工業為核心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醞釀。香港目前處於第三次轉型的困境中。近年,過度依賴金融及地產業的扭曲發展使香港經濟失去調整產業結構的最佳時機,與內地及國際主要經濟體產業升級方向偏離,經濟多元化發展方向受阻。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香港經濟陷入低迷狀態,在產業結構競爭力方面與主要競爭對手差距拉大。^②在傳統實體經濟產業領域,香港企業發展面臨三重挑戰:一是向東南亞或內地中、西部縱深地區繼續轉移,產業結構和產品品質難以突破既有體系與標準,面臨內地同類企業崛起的競爭;二是現代產業鏈的生產技術與工藝的升級,大規模的“機器換人”,引入智能化生產線,面臨福特式規模化生產向“彈性專精”柔性生產模式的增長範式轉型挑戰,而香港工業化道路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導,工業體系發展缺乏應用科技創新體系支撐,高科技的現代工業體系基礎薄弱;三是製造業領域長期的中低端產品定位決定了香港自主品牌難以突破目前歐美高端品牌的壟斷格局。同時,香港本土現代服務業發展能級與內地企業國際化發展市場需求有一定脫節,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別是一些國別市場中未能發揮熟悉國際市場規則的功能作用,且企業及專業人士深入內地市場尋求商機的主動性欠缺。而內地服務業的開放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政策性、制度性、行業性的限制阻礙了服務業領域的實際開放效果。此外,香港企業家專注於短、平、快賺錢方式,長期投資和高風險未來產業投資不足,錯失知識經濟、綠色經濟、智能經濟等跨越發展機遇。

同時,香港政府經濟管理長期堅持“積極不干預”理念,推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在促進香港經濟高度自由、開放與國際化發展的同時也形成了對該理念及其政策、制度體系的路徑依賴,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③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功能與角色長期側重於基建、法律與財政方面,對於發展先進產業的引領與扶持作用有限,相關產業與創新經濟政策支持不足,政策效率不高,錯失全球知識經濟轉型機遇。回歸初期,“最大支持、最小干預”、“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等發展理念的微調及系列支持產業發展、鼓勵創新經濟發展的政策出台,部分提升了特區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能力,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發展理念及其政策、機制體系構建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與突破。

3. 內地重點地區經濟轉型升級,衝擊香港傳統優勢經濟功能

新階段,內地經濟發展全面與世界經濟聯通,構建面向未來的產業經濟體系,銜接全球通行的經濟規則與制度,特別是在重大產業技術突破,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構建,面向未來的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等方面發展迅速。相對應的,內地重點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之香港由絕對差距弱勢轉

變為相對差距弱勢,在部分競爭性行業領域衝擊了香港傳統優勢經濟功能。且在部分新興戰略產業領域,內地重點地區企業發展直接進入全球產業鏈高端環節,參與全球頂級市場競爭,領先於香港。目前,內地經濟對內對外雙重開放的經濟格局,區域發展外部環境改變,由原來的產業鏈關係決定的垂直聯繫轉向創新合作的水平聯繫,技術、人才等高端經濟要素影響權重增加。較之香港,內地重點城市在三次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基礎,區域創新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在第三產業領域正逐步彌補短板,進行功能升級發展,逐步縮小與香港的差距,部分科技領域已經超越香港發展。

此外,在當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西方以“去風險”名義企圖與中國經濟割席,鼓動外資、外企撤離中國市場,作為其中重要資本樞紐的香港受到影響首當其衝,香港在美西方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的特殊性紅利基礎動搖。而疫情後內地經濟處於恢復發展過渡階段,具有吸引力的實體經濟投資標的不足,外資投資意願和收益短期難以恢復,間接影響香港經濟發展預期。如此同時,美國金融市場開始進入降息周期,內地複合多元的經濟刺激政策密集出台,全球資本市場加劇動盪,如何在動盪的全球金融市場中把握機遇考驗香港市場的識變、應變能力。

三、新階段香港經濟發展功能定位

在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及地區政治經濟格局下,香港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突破香港經濟發展階段性困境需要內外部動力同時作用,而來自內地經濟腹地的支撐對於香港經濟具有戰略意義。香港經濟發展內在的結構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治理困境及資源稟賦困境等的諸多方面可以通過內地經濟腹地彌補或突破。目前,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全新的發展目標、發展內涵、發展模式及發展標準等需要全新的發展功能、要素、產業、政策、制度等支撐,這些同樣需要內部探索與外部導入共同驅動。香港作為內地改革開放重要參與者、見證者和受益者,既有發展積累與優勢高度契合內地新一輪發展需求,在內地經濟新一輪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將更加凸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助推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突破自身發展困境,新的經濟功能定位須融合國家及香港特區的綜合發展需求。

(一) 立足內地,面向全球競爭的經濟發展總體定位

香港經濟發展功能定位核心立足於內地經濟腹地,面向全球頂級層次經濟體競爭。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核心功能與產業布局需要高度匹配國家發展戰略,將國家優勢內化為競爭優勢,把握中國經濟在全球崛起的歷史性機遇。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一帶一路”發展倡議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賦予香港明確的發展定位,包括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法律及仲裁服務中心,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總體聚焦於國際金融、高端專業服務、科技創新等關鍵領域。核心是,香港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腹地,以內地整體的市場空間、創新資源、產業經濟等優化自身產業結構,彌補資源短板,提升經濟能級與規模。新階段,內地經濟“雙循環”格局中,對外發展總體趨勢是促進技術、產業、資本、規則與標準等“走出去”。香港服務於內地經濟全球化發展蘊含重要機遇。香港對標世界最高標準,全方位地置換與升級匹配全球頂級市場經濟競爭需求的高端產業體系、要素系統與制度框架等,發展世界一流的經濟體系,特別是先進的科技創新體系與金融市場體系。香港通過參與全球領先經濟中心的市場競爭,在市場博弈中持續提升經濟發展能級與競爭力,以高水平的全球競爭保持經濟的韌性和先進性。

(二) 以金融創新構建全新內涵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全球及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新格局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需要新的發展內涵支撐。首先，香港科技金融創新與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智能機器人等世界新一輪產業技術發展標誌性方向結合，通過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以未來產業、未來科技發展的金融市場需求夯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基礎。其次，在綠色金融方面，香港基於全球綠色金融市場差異化發展的合作需求，在不同類型主體間綠色金融市場合作的規則、標準、平台等方面進行對接與轉換，核心是以內地綠色金融市場發展為基礎，在全球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碳交易、ESG 等領域拓展與引領，成為亞太綠色金融中心。再者，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融入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尋求數字貨幣、“一帶一路”倡議、“石油人民幣”、離岸人民幣樞紐等內地新一輪發展周期中的新機遇，吸引新產業、新科技、領先企業進入香港資本市場，深度開發內地財富管理市場，以高質量的創新金融合作突破香港金融市場的既有內涵、能級與規模。由此，香港金融中心發展建立在科技金融創新、綠色金融創新，及內地新概念金融創新等基礎上。

同時，香港通過“債券通”、“理財通”、“互換通”、“滬港通”、“深港通”等，及未來更深層次、更加多元的合作機制與路徑，發展融合兩種經濟制度、兩種市場機制優勢的金融服務功能，超越傳統西方金融中心的發展內涵，獲得獨特比較競爭優勢。香港金融服務在繼續保持對歐美金融市場吸引力、競爭力的同時，積極拓展新興經濟體、第三世界國家、全球南方市場的金融服務市場。香港與上海、北京等內地國際金融中心通過優勢互補，摒棄低水平的同質競爭而聯合參與全球頂級金融市場競爭，共同塑造中國金融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三）聯結全球與內地創新要素資源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在面向未來的全球科技創新競爭的複雜環境下，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能夠發揮獨特作用。香港最大的優勢和特點是國際化的資源整合能力，具備聯通全球科技創新要素資源的基礎和優勢。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發展以符合國際要求的規則、標準、機制等創新軟環境為基礎，集聚全球頂尖的研發人才，創辦全球頂級水平的實驗室，在全球範圍內組織、布局或集聚研發資源與創新要素，構建全球創新網絡，展開國際前沿領域的研究。同時，香港科研體系深度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以國家重點實驗室、大科學裝置、兩院院士、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等為抓手，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科技產業領域，以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為契機，依託香港、廣州、深圳等極具創新特色和優勢的超大城市，構建廣珠澳、廣深港“V”型科技創新走廊，形成“研發—資本—市場—服務—技術—人才”全要素創新網絡。在南沙、前海、橫琴等試驗區先試先行推進跨區域創新合作，通過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科技園”等空間和功能載體、平台推進區域協同創新。未來香港全球創科中心發展立足於大灣區，打造具備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服務於國家創新發展戰略。

（四）全球標準與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中心

標準競爭是國際產業競爭的高級形式，是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國際產業經濟競爭格局由產品競爭、企業競爭演進到區域間綜合實力的整體競爭，演變成規則、標準體系的競爭。在全球經濟高階競爭中，標準成為大國謀取壟斷利益、獲取非價格競爭優勢的戰略手段。發達經濟體基於先發優勢及既往發展積累控制國際標準的話語權和領導權，將本國標準轉化為國際標準，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獲得超額市場份額及經濟利益。在全球關鍵新興產業領域，標準競爭先於技術競爭，實質是爭奪產業制高點。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搶佔新興產業的制高點，通過壟斷標準和評定規則制定權，將發展中國家產業經濟鎖定在“微笑曲線”低端。同時，世界

貿易組織賦予國際標準貿易規則的地位與作用,標準成為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進行貿易保護和制裁的重要工具。主要經濟體將部分貿易門檻由關稅轉為技術標準,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標準與專利“捆綁”,成為專利技術追求的最高形式。

新階段,內地創新經濟和高端服務經濟發展對標準和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更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向全球發達市場,新產業技術標準和創新知識產權交易是重要途徑。標準和知識產權交易依託嚴格的市場機制與法律體系。香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法律體系、商事規則,及專業的國際化企業與人才等為全球企業、市場和地緣政治主體廣泛認可和接受。在特殊的內外部環境下,香港發展全球標準與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中心,作為內地與全球進行標準和知識產權銜接的中樞,能夠為國家融入全球主流創新經濟及高端服務經濟市場發揮特殊的作用和價值。且相關產業市場空間和潛力巨大,將進一步培育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經濟能級和影響力。

(五) 全球領先營商環境發展示範與內地導入

香港全球領先的營商環境支撐高度發達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香港作為全球營商環境引領者,其先進營商環境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競爭驅動的多元要素構成。首先,基於制度信用與信譽的國際化的商業規則與文化、法律體系、仲裁機制、國際標準等制度性軟環境構成香港營商環境的關鍵內涵。其次,香港自由港經濟體塑造特殊營商環境,在商貿、投資、財務、財政、產權、政府支出等方面構成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關鍵支撐,是營商環境核心競爭力構成。再者,香港簡單稅制降低資產保值風險與資本運行成本,對於國際貿易結算,證券期貨交易、財富管理、私募投資等資金流巨大的行業企業,以及企業家、專業服務人士、高級管理人才等高收入群體具有足夠吸引力。最後,香港以市場機制與要素建構的多元商業及專業服務,包括仲裁、法律、管理諮詢等,形成系統性、綜合性、整體性的服務體系,滿足高端服務經濟的專業性、多樣性及個性化需求,支持香港主導服務功能高效發展,成為營商環境功能支撐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國際一流標準的營商環境是內地發展對標的重要標準與對象。目前,內地大力推進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進新一輪的制度型對外開放。內地通過與香港持續的制度銜接,選擇性地導入其先進營商環境核心要素,逐步構建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在與世界接軌的經濟政策、制度、規則等方面逐步獲得全球的認可和接受。由此,進一步吸引全球資本、高端人才和創新技術等進入內地市場,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能級與質量。

(六) 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前進“基地”及“試驗場”

近年,內地和海外優秀中資企業加速進入香港市場發展。香港依託自身獨特地位和優勢成為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前進“基地”和“試驗場”。中資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探索、學習和成長的過程。香港市場的金融服務功能,專業服務功能,信息交流功能等能夠極大地提升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水平與競爭力。特別是,香港國際規則實踐功能能夠全面改造和升級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質量和能級。中資企業國際化發展,以香港為投融资平台,開展海外投資併購,實現全球業務擴張;以香港為海外總部,集中管理境外資產,建立國際化管控體系;以香港為企業研發平台,整合全球科研資源,構建國際創新網絡;以香港為區域總部,輻射周邊新興市場,提升品牌國際形象;以香港為合作基地,布局境外產業園區,推進國際產能合作;以香港為試驗場,基於國際標準對企業及其管理團隊進行國際化規則,商業文化,市場機制等的全方位“合規”培養與調整,進而以國際化跨國企業面貌與內涵參與全球企業合作與競爭。培育中資企業國際競爭力是香港的重要經濟功能,在此過程中,進一步鞏固香港經濟的多元結構和全球競爭力。

四、新階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選擇

全新的戰略定位需要通過合適的發展路徑與方式落地實現。新階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路徑選擇必須符合香港與內地最新的產業經濟發展特徵與需求,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優勢尋求新的合作內涵、模式、形式與途徑等的創新。

(一) 與內地重點地區合作內涵與模式創新

香港與內地重點區域的合作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直接途徑。新階段,內地高質量轉型發展的本質內涵及客觀需求改變香港與內地合作的領域及重點內涵。首要是全面升級粵港、滬港、閩港、京港、深港、川港等區域性合作機制的內涵與領域,突出科技創新與高端服務經濟方面。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方面集聚內地先進地區與香港的優勢特色資源,發展綠色低碳、數字經濟、智能終端、元宇宙等新賽道產業,並布局專業服務、金融服務和航運服務的高端環節以引領發展。合作模式轉變為內地“資本”+香港“資本”、內地“資本”+香港“創新”、內地“創新”+香港“服務”、香港“創新”+內地“產業”、“香港+內地”+“服務+資本+產業+X”等。新模式最大特點與趨勢即是由傳統的基於產業鏈上下游的垂直式分工合作轉向基於創新鏈功能鏈接的水平式分工合作。同時,香港與內地不同地區合作體現差異性布局。例如,京津冀地區集聚內地頂級高等院校與研究機構,高端人才雲集,合作重點聚焦科技前沿、關鍵技術聯合攻關。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市場化機制優勢明顯,集聚全球領先的大型企業集團且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高,推進以企業為主體的區域創新產業網絡合作及獨角獸企業聯合培育。長三角地區區域一體化優勢突出,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和功能,在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等方面實現突破。

(二) 以制度性要素優勢全面融入內地高質量發展轉型

新階段香港制度性軟環境要素成為對內地投資與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地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第三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客觀需要運用全球主流的商業文化與規則、機制、標準等重塑並升級服務經濟內涵與結構,以世界通用“話語體系”參與全球先進企業的合作與競爭。新階段,香港經濟融入內地,以市場經濟規則與制度為最大公約數,基於“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創新進行內外部市場經濟制度與規則的銜接與融通。

香港服務經濟體系“北上”融入內地市場,首先是通過特區政府及相關行業協會與內地中央及地方經濟主管部門溝通協商,積極推進內地逐步放開服務經濟的市場准入,爭取內地經濟吸引外資優惠政策重點由第二產業領域向第三產業領域延伸,逐步開放相關行業准入的類型及門檻限制,在法律適用、資質認證、規則對接、標準規範、行業准入、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建立起適合國際企業方便進入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制度內涵。特別是在內地主要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港發展進程中,先試先行突破部分規則與制度限制,配置香港全球領先的營商環境的制度、法律、規則、標準等要素。其次,香港商業服務與專業服務企業、行業協會、政府職能部門以及專業人士,通過派遣辦事處、分支機構、先遣團隊、與內地同業者合作等方式,積極主動開拓內地經濟市場。在本世紀初,在可預期的時間節點內,只有中國經濟整體處於工業化階段向後工業化階段演進,且具有足夠的經濟體量與容量,是高端服務經濟賴以依存發展的新的發達經濟體最可能的地區。香港服務經濟提前布局內地主要市場奠定其未來穩定發展基礎。

(三) 基於高科技產業合作促進新的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融合

當前內地經濟升級轉型,部分傳統產業領域的香港企業難以繼續保持競爭優勢,成為新一輪國

際產業轉移的組成部分。首先,香港實施“再工業化”進程,基於既有科技與產業基礎,配合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選擇具有核心技術突破、行業壟斷突破、新興科技領域突破的產業,如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數據科技、新能源汽車、半導體芯片等,深度融入內地新興高科技產業供應鏈體系,與內地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建立新產業鏈聯繫。其次,香港通過資本、技術、市場等既有優勢資源布局於亞太具有高速經濟增長潛力的地區及行業,涉及中國、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的綠色低碳、數字經濟、智能終端、元宇宙等行業,把自身的發展與亞洲其他高速發展地區的經濟體捆綁起來,拓展本土產業空間,以優勢外部資源完善其內部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

(四) 依託重點科技園區合作,拓展科創中心合作空間載體

香港高端製造業發展要突破地域空間限制,以內地高品質的科技產業空間拓展全球科創中心腹地支撐。首先在大灣區範圍內,以深港河套科技園區合作為抓手,試點跨境園區合作具體政策、機制、項目與方案等突破,深化香港科學園與深圳光明科學城、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國家級科技園區載體平台的合作,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科技園區在科創產業布局、要素流通、資源配置等方面的空間載體供給與優化。其次,進一步升級香港與內地北京、上海、合肥、武漢、南京等高科技產業發達及研發資源密集的重點城市科技園區的合作,且合作重點突出區域特色科技產業基礎與優勢,以內地工業園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升級或“騰籠換鳥”為契機,新置入“香港高科技產業園”、“香港未來科技城”等飛地型實體經濟,加速香港創新成果的市場化、產業化落地發展,充分利用內地優勢資源彌補短板,夯實香港先進製造業實體經濟基礎。再者,通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選擇性投資內地具有戰略前景的高科技產業孵化器或科技園區,以創新資本為紐帶拓展創新空間。

(五) 以高端人才的培育和流動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21世紀,金融和科技成為全球競爭的關鍵領域,兩者均對於高端人才的素質、規模與結構有特別高的需求與依賴。新階段香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要素、產業、功能、制度等不同領域的發展融合過程中,高端人才的培育與流動更具有指標意義,也是履行國家賦予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使命的必然要求。特別是,香港全球領先的大學在內地辦學,內地學生在香港高校深造,亦有相當規模的來自兩地的高端人才進入彼此空間工作。新階段,面對複雜的競爭環境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基於香港的特殊優勢與需求,兩地高端人才培養與流動更具有戰略意義和價值。兩地以高端人才為紐帶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一是發揮香港與內地兩種教育、科研制度的優勢,聯合培養世界級的頂尖科學家群體;二是以靈活多變的形式吸引全球優秀人才進入國家整體的科研、教育、經濟、藝術等體系,在港創造足夠的吸納全球華人高端人才的平台和載體空間;三是利用深港河套重點合作區的特殊政策條件建立直接服務於特定創新鏈、產業鏈的合作研發機構的高端人才基地;四是通過制度和政策創新,實現兩地高端人才更加自由、便捷與高效地流動,逐漸形成兩地人才共育共享,全球人才流入的格局。

(六) 加入全球及區域性新經濟貿易規則與制度框架談判

香港通過主動融入全球發展大局以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發揮其特殊性的根本路徑。香港基於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地位能夠在全球及地區經濟格局中發揮特殊的作用。香港作為相對獨立的城市發達經濟體,與全球經濟網絡具有廣泛而深入的聯繫,在全球金融、貿易、航運等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在特定經濟功能領域彌補或者優化內地經濟結構,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特別是,全球經濟及亞太地區經濟格局處在深刻變革中,隨着全球經濟中心東移、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經濟計劃執行,地區性經貿組織及雙邊、多邊自由貿易談判進程日益緊密。香港特區作為獨立經濟體具有高度

的自主權。在全球及區域性新一輪經濟貿易規則與制度制定過程中,香港作為獨立的經濟體參與談判,積極與內地溝通配合,在談判中爭取最大的整體利我規則。特別是在內地因為地緣政治因素而被排斥、抵觸的經貿談判中,積極發聲,爭取更大的整體利益。

-
- ①強世功:《“一國兩制”新篇章——重新思考香港在國家戰略格局中的定位》,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6期。
- ②劉凱、吳崇伯:《新時期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升級研究》,福州:《亞太經濟》,2021年第1期。
- ③李曉莉、申明浩:《新一輪對外開放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和建設路徑探討》,廣州:《國際經貿探索》,2017年第9期。
- ④謝寶劍:《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協同發展研究》,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4年第2期。
- ⑤梁經偉等:《影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發展的因素研究》,昆明:《經濟問題探索》,2018年第5期。
- ⑥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1): 69- 83.
- ⑦Henderson V, Lee T, Lee Y J, Scale Externalities in Ko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1, 49(3): 479 - 504.
- ⑧Zhao X B, Guo N S, Li C L K, et al, Megacities, the World's Largest Cities Unleashed: Major Trends and Dynamic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8: 257- 289.
- ⑨BELA 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Press, 1961.
- ⑩毛豔華、楊思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制度創新》,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 ⑪Taylor P J, Derudder B, Hoyler M, et al, New Reg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World as Practised by Leading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in 2010,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3, 38(3): 497 - 511.
- ⑫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⑬Tinberge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 1954.
- ⑭林毅夫等:《比較優勢與發展戰略對“東亞奇跡”的再解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
- ⑮楊英:《從“超級聯繫人”角度論香港經濟發展定位》,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 ⑯倪外:《構建新時代對外開放型經濟體系》,上海:《上海經濟研究》,2022年第5期。
- ⑰張占斌、畢照卿:《經濟高質量發展》,北京:《經濟研究》,2022年第4期。
- ⑱薛鳳旋:《香港工業化與工業地理》,長沙:《經濟地理》,1997年第3期。
- ⑲蔡赤萌:《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中的香港經濟功能》,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
- ⑳王春新:《2019年香港經濟形勢及2020年展望——兼論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北京:《港澳研究》,2020年第2期。
- ㉑鍾韻、賀莎:《回歸以來香港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2期。
- ㉒蔡赤萌:《回歸初期香港經濟管理理念探索》,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3年第4期。
- 作者簡介:倪外,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上海 200020
- [責任編輯 劉澤生]